

繽紛盛宴——

多源（元）共生與中文學門

鄭毓瑜*

2010年初春，北美還籠罩在一片冰天雪地中，我與楊儒賓教授一起參加在哈佛大學舉辦的“Humanistic International”國際學術研討會。正在對抗時差的某個清晨（或晚上），楊教授突然提起「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的構想，並且要我在回國後，一兩日內就要交出五千字左右關於中文學門百年發展的初稿，作為第一次籌備會的參考。這讓我接下來在康橋的兩個夜晚，更加徹夜難眠，「百年」魔幻寫實般地湧現。

我很清楚，最讓人輾轉不安的正是這工作的複雜度。我們早已習慣在劃定的學門內，提計畫、做研究及教學，比較少轉換視角，由外向內看、由整體來定位個別研究，因此，「百年傳承」的反思，必然會牽動許多關鍵概念、甚至是學門或學科建制的重新建構。一旦談起「百年發展」，就已經是個「由後視昔」的立場，等於是在「現在」角度下談論過去，在羅列各項人事作品之外，必然同時以當今的眼光去進行分期或判斷。「百年發展」無可避免是選擇、建構的後設性產物，它無法預設原本有一個不變的真相，就理當無法僅僅屬於特定的哪一個時空環境，而可能是不同時代所混合參與的成果。那麼它的界限——各種排除與不排除的成分、有效與無效的實踐、中心或邊緣的價值，都可以說是這個傳統的圖譜的一部分。換言之，這不必是那樣鮮明、突出的、那樣堂皇而完備的主流，反而總是含融在重重交錯、去而復來的環境中。而比「百年發展」更複雜的問題，是「中文」所指稱的學術研究領域，從傳統小學、學術思想到古今文學（及美學），乃至於晚近加入的應用華語（華語教學）、臺灣文學、域外漢學，甚至是大眾文化或流行文化（包含圖像影音等多媒體呈現方式）；這明顯已經牽涉史學、哲學、語言、藝術乃至於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召集人。



文化研究等領域，其中所跨越的時、空環境及理論方法，根本無法從中文(或華語、漢字)的單一語文屬性與使用的族群、地域去簡單歸類。

但是正因為曲折複雜，就越發獨特繽紛。時間甬道裡傳來各式呼喚、各色風景，逐漸地，霧慢慢散去，總主持人楊儒賓教授為整個臺灣的人文傳承做出「中日雙源頭—雙源匯流—在地轉化」的三階段定位：中、日雙源頭與1949、1987兩階段的再整編。對於「中文」學門來講，這個探討框架，既有包容，也有超越。從日據到戰後，殖民或再殖民所造成的認同拉鋸、思想拘囚，弔詭地伴隨著殖民帝國引進的現代化，與國府遷移來臺的機構、人才，交互作用；孤島內為標榜正(政)統的文化復興運動，卻意外地成為海外華人文化永續的明燈；而近來古典思想研究、本土的臺灣文學研究，一起放在整個東亞視野上，所交互映發的文明勝景，更超越了古今、地域、族群的藩籬，巧妙地與二十世紀以來國際化的潮流相互接軌。歷史從來相互傾軋、但是原來也相互成全，文學與文化因此常在黑暗的盡頭，出現柳暗花明的轉機。

臺灣「中文」學門在這個「多源」又「多元」的發展中，擁有比世界上其他地區的華語文相關研究，更為厚實的基礎，以及更為豐富的跨領域資源，我們身在此中，可能不自覺也不夠珍惜這個優勢。2011年也是初春，我應邀參加上海哈佛中心舉辦的“Human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工作坊，在會中報告臺灣高等人文教育的現況；尤其著重臺灣在經典教育、人間宗教、民俗藝術的普及與活力，以及臺灣「中文學門」在教學上四部不分，研究上則呈現古典與本土攜手並進的狀況。主席葛兆光教授坦言，他第一次聽到臺灣中文研究如此複雜多元，陳平原教授覺得北京大學應該也要恢復全校大一國文的課程，陳來教授則認為臺灣如此廣博的教研成果，正是人才培育最關鍵。我表面上不動聲色，但是心裡不免激動，兩岸除了經貿議題，是否還應該有文化議題，那麼這樣的競爭優勢，政府看到了嗎？

自古典傳統來說，廣義的「人文」化成，一直是經史子集四部不分的完整結構，這樣的結構要到上世紀(1905)廢科舉之後，才被西方劃分學科的教育所取代，從此進入專門科目培養專才的時代。不過，與大陸相較之下，臺灣的中文系基本上保存了舊學傳統，而大陸中文系或文學院多以教研室(系)分科劃界，各自招生、開課，互不關連，比如學生由文藝學(或文藝理論)入門，則不可選修古代文學或近現代文學教研室的課程，更不用說中國語言、文字、訓詁、聲韻這些閱讀古典的基礎訓練。另外中國思想、經學都放在哲

學系，因此即便許多中文系師資陣容浩大，動輒百人，但是大陸重點大學的中文系學生所學明顯較為狹窄。臺灣則保存了完整的學科規模，尤其回到語言文字——語文學及其所在的環境脈絡，最容易達成新舊學或古今漢學之間的對話與交融的可能。

今日重回漢字或華語文的討論，當然不只牽涉本土或兩岸議題，漢字及其所成就的漢學，作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整個東亞面對與接受西學、新學的最根本的管道，如何透過多迴圈翻譯（中—日—英）過程所啟動的漢字（文）大改造，而由傳統過渡到現代，也正是「漢學」這個知識領域或學科體制最關鍵性的建構過程。傳統語言文字在這裡遇上了四面八方的挪借、誤用或改造的新用，這些駁雜不純的語言卻擔負了知識傳播、生活改造的重任。如果中文或華語文真有可能成為未來世界上第二大學術語言，那麼我們無法迴避、也必須反省，二十世紀初漢語在舊語詞、新學語的交雜叢生下，究竟變造出什麼樣的「學術性」，而那又包含了什麼重新架構的知識體系與如何轉向現代化的人文學傳統？以臺灣文史學界目前對於傳統漢語文獻研讀上的扎實訓練，有能力而且有責任來承擔這項漢語語文歷經翻譯、變造與概念化的爬梳工作。2011年10月14-15日兩天，人文處中文學門與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臺灣漢學新世紀」論壇，正是透過不同領域（如經學、美術、戲劇、思想、比較文學、史學等）、不同地域（如日、韓、歐美）為所謂「漢學」這個概念進行多元考掘，這可以說是當前語詞概念史研究的重要一步。¹

當然，獨門之學，如果不能成為「共同之學」，在強調跨領域與國際化的今日，都不容易發揮影響力。中文學門內次領域極多極細，彼此對談討論的機會不足，甚至單一領域內的成員彼此都缺乏溝通，遑論與其他學門的對話。這一方面無法有效整合學門內相關研究，提出重大研究成果，同時也無法與其他學門相互補強，經由討論與合作，而針對共同關注的議題做出貢獻。但最近幾年來，國科會人文處與人文學中心在這方面努力扮演媒合研究社群的角色。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在2005年委託所屬學門進行國內學術研習營規劃，中文學門規劃案委由臺灣大學鄭毓瑜教授主持，希望透過學術研習營的舉辦，可以讓資深講者與年輕學者共聚一堂，進行成果分享與經驗交

¹ 詳細會議報導，請參見《漢學研究通訊》第30卷第4期，2011年11月。



流，除了聚焦式地呈現中文學門近年來的研究趨向，更可以因此建構校際間學者們相互的理解與緊密的聯繫，成為未來提出整合計畫的人力平台。目前已由國立暨南大學與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分別於2010年1月與4月承辦了「明清文化研習營」與「隱喻·抒情與敘事·觀看——中文學門跨域整合研習營」，前者著重敘事文學與文人文化的探討，呈現暨南大學中文系、歷史系與中研院文哲所相關領域學者長期合作的成果；而後者則成功整合中正大學中文、語言及哲學相關係所同仁，並以「隱喻」這個問題意識為中軸，不但貫通中文學門在經典詮釋、詩與詩學、明清文學敘事與歷史語境等領域，同時也有語言學與哲學研究者加入對話，一個既古老又新穎的「隱喻」論述，成為匯通中文、哲學與語言學門更進一步合作的契機。

這樣的學術研習有它縱深的專業根底，也同時有廣泛接收新知、構想新視域的雙重效果。而在學術研究強調國際化的今日，如何將國內重要研究成果推介到國際學界並進行深度對話與合作，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過去中文學界普遍各自為政，當然不易推行，但是近來在各項整合計畫與學術論壇努力推動下，許多國內外學者共同參與的主題研究計畫（如關於「空間地域」、「身體與自然」、「主體與修身」等計畫）已經形成對話氣氛。而如何凝聚中文學界在研究與學術訓練上的共識，似乎需要有一個深具功能性的「學會」來主其事。在前幾任學門召集人，包括李豐楙教授、鍾彩鈞教授、王安祈教授、葉國良教授、楊儒賓教授的催生之下，「臺灣中文學會」終於在2011年11月20日召開成立大會，並在常務理事中推選楊儒賓教授為第一任理事長，我們期許這個學會往後可以成為溝通意見與整合力量的平台。

一個學門的發展史，也必然是不同知識體系的爭逐競合史，更應該是每個研究者的學力、情識的成長史。在這次「百年人文傳承」大展之前，廖美玉教授於逢甲大學舉辦「百年百部中文學術經典專著展」，展出經典包括有章太炎《國故論衡》、梁啟超《近三百年學術史》、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連橫《臺灣通史》、臺靜農《楚辭天問新箋》、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廖蔚卿《六朝文論》、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等等。透過如此多元豐富的經典，我們不只是汲取學術的養分，我們也發現那些流離在途的大師身影，如何苦心孤詣只為點燃傳承的火光；發現如今熟讀的經典，如何閃耀恆久的智慧與嶄新的洞見；發現在詭譎變換的政治局勢間，有多少知識分子化身為堅持的磐

石，又有多少事件改變了歷史的航道。「百年樹人」，百部經典在字裡行間鋪陳了臺灣人文學術的源流脈絡，同時也以一種行進中的姿態，持續灌注人文在地化與國際化的繽紛未來。